

批評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

• 劉 康

批評理論的新課題

美國《近代中國》(*Modern China*) 1993年第一期引發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意識形態與批評理論的爭論，後又在《二十一世紀》、《今天》等中文雜誌上繼續展開，主要由張隆溪先生與筆者互相回應、駁詰^①。作為當事人，雙方已各有三篇文章闡明自己的觀點，也許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不過，討論之中產生出的一些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探討。筆者在《今天》發表的文章，即以爭論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對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文化傳統的評價問題——作為繼續爭鳴的主題以及對批評的回應。我的前提是對理論和學術研究作歷史的自省和反思，在這點上，我與張隆溪先生並無分歧。《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的張文強調「如果說批評理論是對文學和文化作批判的思考，那麼採取真正具有理論性的立場，首先就要對理論本身作批判的思考，以達到對自己所取理

論立場的自覺意識。」^②包括張隆溪先生和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在作這種文化的批判和理論的批判，並且有了一定的成果，這是值得欣慰的^③。筆者在《二十一世紀》上的前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文學研究「由歷史主義向文化批評的轉折」。現在看來，變化已更為深入和多元，呈現着令人鼓舞的新局面。除了歷史的發展和機遇等因素，當前學術局面的產生，「批評理論」功不可沒。

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特指80年代至今在西方文化界、學術界流行的種種文學、語言學、心理學、歷史和哲學理論。近年來，理論的焦點是所謂後現代文化現象，由開始時對西方文化傳統的批判，轉向對世界文化的差異、變局、對話與轉型問題的思考。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的視角和範圍日益擴展延伸，由「本文」、「話語」的解讀、闡釋，更深入地捲入對性別、種族、經濟、權力、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干

對於批評理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批判性的不同立場，構成了筆者與張隆溪先生的基本分歧。

預。簡言之，當前西方的批評理論具有鮮明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批判色彩。這體現了在世界新格局下，面對社會與文化轉型的現實，西方人文學術界所作出的選擇和反響。對於批評理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批判性的不同立場，構成了筆者與張隆溪先生的基本分歧。我們已就批評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關係作了討論。討論中涉及到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傳統以及中國80年代文學創作、批評和理論潮流的關係問題。筆者擬針對張先生的批評和再批評，進一步闡明自己對上述問題的一些看法。我的看法粗淺疏漏處在所難免，歡迎張先生與其他學者批評。不過我以為大可不必像張先生那樣，一再指責筆者「缺乏基本語文常識」、「對伽達默的哲學還未能得其門而入」、「應該說是懂英文的」，不知何以誤解「淺近的英文」等等。至於一會兒給筆者戴上一頂「新馬克思主義信徒」的帽子，一會兒又說我的政治神經「極度敏感」，「對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階級鬥爭仍然是看家的行當」云云，恐怕亦不是十分理性和平等地討論問題的態度，不見得有助於「在更高的一個層次上」展開討論④。

當前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即是根據中國的現實，確定我們的立場，對批評理論作深刻的反省。張隆溪先生與我的立場和位置不同，這並不妨礙我們作共同的理論探索：過分情緒化的指責，看來就無必要。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問題。我在《二十一世紀》前文的註釋裏，曾婉言提到了張先生以“ghetto”來形容中國文化／中國研究的不妥。該詞無論從字典涵義還是現代英文用法中，均有西方都市中種族隔離、社會壓迫和經濟貧困

的「貧民窟」含義，與“slum”常用作同義詞。但卻引來張先生的憤怒，作為我「竄改歪曲」他原意的重要證據⑤。這種例子在張文中比比皆是，恕不一一列舉。

批評理論與 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西方當代批評理論的主要哲學與思想來源之一，便是二十世紀蓬勃發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一向關注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無論是十九世紀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還是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官方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本世紀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發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特別是文化領域內的政治衝突與矛盾。盧卡契(G. Lukács)、葛蘭西(A. Gramsci)、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哈貝馬斯(J. Habermas)、英國「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詹明信(F. Jameson)等，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思想、心理和意識形態領域裏，批判、反思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造成的人類主體、存在、自然與文化、意識與潛意識的種種危機。西方馬克思主義成為西方文化界一股影響廣泛的思潮，並成為學術界的「顯學」之一，則與60年代末、70年代初席捲歐美的政治、文化風暴有直接的聯繫。

70年代初在法國社會與人文學術界崛起的批評理論——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權主義、解構主義、接受美學……基本上是60年代末政治風暴後文化知識界的餘波和積澱。這點不僅從批評理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當代批評理論和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的主要理論來源。瞭解歷史現實的內在聯繫，是把握當代批評理論政治批判鋒芒的關鍵。

批判鋒芒中可以見出，而且從福科(M. Foucault)、德里達(J. Derrida)、克里絲蒂娃(J. Kristeva)、巴特(R. Barthes)、利奧塔(J.F. Lyotard)以及詹明信等的學術生涯和思想演變中可以一目了然。西方馬克思主義強調「文化批判」(Kulturkritik)，反對「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與大眾文化的商品性「文化工業」，主張「否定的辯證法」。這些不僅是68年「五月風暴」的思想武器，也是當代批評理論和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的主要理論來源。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兩面作戰，對蘇聯東歐官方意識形態的列寧和斯大林主義以及蘇聯極權主義政治作激烈批判。當代批評理論對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都採取批判、否定的態度，這點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是一致的。60年代末的政治、文化風暴，實際上是全球性的。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蘇聯東歐社會內部衝突的爆發，與巴黎街頭的「五月風暴」和美國的反越戰爭學潮等，均有深刻的聯繫。瞭解歷史現實的內在聯繫，是把握當代批評理論政治批判鋒芒的關鍵^⑥。

6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社會史與思想史上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批評理論的影響和意義，都是不可忽視的。毛澤東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強烈的「文化決定論」、「意識形態決定論」品格，毛主義的激進的反官僚、繼續革命的理論與造反精神，對馬庫塞(H. Marcuse)、阿爾圖塞(L. Althusser)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過不小影響。我在英文論文中提到福科的權力與知識的關係理論及其與毛澤東思想的聯繫，旨在把毛式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代批

評理論的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的關係，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提出來。這對於我們批判、思考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批評理論，對於我們剖析、思考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化，都是很有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傳統，對中國的「現代性」(modernity)問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討論中國問題時是不能迴避和繞開的。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對這個問題已有了相當大膽、深刻的探討(應指出的是這種探討中最有分量的，是來自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異端」，如李澤厚、金觀濤等的理論批判與探索)。不過，當時的學術討論主要集中在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啟蒙」與「救亡」，以及對中國古代的儒家文化傳統的批判等問題。對於毛主義的問題，由於政治上的敏感以及文革剛剛過後的距離感較缺乏等複雜原因，尚未全面展開。毛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亦很少提及。

總之，研究批評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潮(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毛主義)的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需要在世界文化的轉型、差異、對話的視界內，作很多細緻的探討。這點張隆溪先生大概不反對，他也認為詹明信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挑戰有助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走出自我封閉的圈子。不過在另一方面，張卻把筆者關於福科與毛的關係和對文化的政治性的看法，說成是「以福科證明毛的正確」^⑦。他先前的文章還以較和緩的語氣說「我對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文學是『民族諷寓』的看法以及劉康提出的政治參與和關聯的主張表示懷疑」^⑧，後來便以激憤的口吻把筆者形容成一個鼓吹階級鬥爭的鬥士。這樣實際上把筆者提出的問題重又轉向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傳統，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討論中國問題時是不能迴避和繞開的。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對這個問題已有了相當大膽、深刻的探討。



揚棄思想上的單一霸權，建立多元開放的言論氛圍，是學術發展得以持續的關鍵。

對馬列主義和「極權主義政治的災難」的鞭撻，所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反對自由與多元」的邏輯。這恰恰是筆者的文章中多次指出的長期以來支配着西方漢學界的一種偏見，是一種簡單化的二元對立的邏輯。當然，這種邏輯在多年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影響亦極深，是我們文化批判與理論自省的一個主要對象。

此外，我的確認為，正因為「我們有幸生長在毛的中國」，對於中國的「階級鬥爭」和西方反共的冷戰意識形態，均應有較深刻的認識與批判。我認為當代批評理論有助於加深我們的這種認識與批判，開拓我們的視野。這便是我的理論立場。在思想自由與學術多元的氛圍中，我的立場當有一席之地。立場各有不同，堅持反共是一種立場，自由主義也是一種立場。不過我認為自由主義立場和思想自由、學術多元的氛圍並不是一碼事。在這點上，當代批評理論中很

有影響的巴赫金的「語言雜多」(heteroglossia)理論對我們很有啟迪。巴赫金主張，語言雜多是文化轉型時期單一的話語中心和意識形態霸權解體，各語言與價值體系互相衝突、撞擊、對話、交流的歷史現象，是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局面。但語言雜多不等於自由主義立場的勝利，而是不同觀點、立場的對話與交流，不同立場與位置的同時共存是語言雜多的關鍵^⑨。像布什競選美國總統時，得意洋洋地宣佈蘇聯東歐的解體乃是「自由民主」的最後勝利，只是一種價值體系和立場。如果依此來建立新的話語中心和意識形態霸權，便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最近亨廷頓重申歐洲中心的「文化衝突論」，難道不隱含着新的冷戰意識形態嗎？把我的這種理論思考硬說成是「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觀點，並與「思想自由，學術多元」對立起來，是某種意識形態立場的老調重彈，還是對理論本身的「批判的思考」？

批評理論與中國八十年代 文化思潮

我在《今天》的文章中，提出了產生於80年代的中國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指的是70年代末開始的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金觀濤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的科學主義的修正，李澤厚從美學、哲學到中國思想史領域裏的理論開拓，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觀點，嚴家其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等等。他們均是從中國的文化實踐和馬克思主義體系內部出發，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的問題。甘陽等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和《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以譯介西方現代人文思想名著為主，集中了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批評理論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介入到「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辯論中。湯一介、龐樸等的「中國文化書院」，則聚集了一批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深厚理解，又長期治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專家。雖然80年代的中國並未產生法蘭克福學派那樣有組織、有系統的學派，各觀點的理論傾向與側重、學術層次與範疇都不同，但已形成了與中國官方馬克思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不相同的重要思潮。

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最有影響的是李澤厚的美學—史學思想。李澤厚以康德主體哲學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起點，首先闡述了美學主體觀(李的主體論直接影響了劉再復的「文學主體論」)。接着，李澤厚由美學轉入思想史，將80年代初的「美學熱」引入80年代中期以歷史反思為核心的「文化熱」高潮。文化熱這段時期，也是中國的文藝創

作與批評空前活躍的時期。文化熱突出審美意識，以美學帶史學，以文化論政治，形成了「美學—史學」的話語形式，李澤厚可說是開風氣之先。李澤厚等在文藝、美學、意識、心理領域裏的探索，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軌迹有驚人的相似。但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又有自己的特點。李澤厚等的馬克思主義主體美學具有批判和建設兩重意義。它既批判毛澤東的文化政策，又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主張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重建人的主體和中國文化。作為80年代文化反思的主導思潮，李澤厚等的思想有鮮明的啟蒙色彩，強調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和反封建。另一方面，他們又努力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某種理性結構以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換」。中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們並未跟隨西方思潮的「日程表」，在反主體、反整體論的鼓噪中堅持歷史的整體觀和批判與建設同時並舉的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理論異端，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提出的問題和思考的角度、立場，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代批評理論是不相同的，有其獨特和不可替代的意義。

80年代的中國文化界，面臨的是文革後社會意識形態危機和現代化建設的轉型時期。這個時期文化思想界的特點便是「語言雜多」。不同價值體系與觀念，從「新儒家」到「後現代主義」，從薩特到德里達，各種學派、觀點、語言圍繞着「傳統」、「現代」、「後現代」的話題，眾說紛紜。不過，這個時代的主導話語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這不僅僅是因為官方意識形態或文化霸權的控制和影響，而且是因為中國二十世紀中七、八十年來

中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們並未跟隨西方思潮的「日程表」，在反主體、反整體論的鼓噪中堅持歷史的整體觀和批判與建設同時並舉的辯證法。

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傳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們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作自省式的理論批判與反思，雖然其對象和歷史語境與西方不同，但與西方批評理論和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卻有耐人尋味的相似之處。兩者起碼在理論的自覺和政治干預性這兩點上，有着顯而易見的相互呼應與映照。不過，文化反思以美學帶史學，以文化論政治的方式，終由於政治原因而在89年之後被迫退出大陸的思想舞台，新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受到了官方的強烈抨擊。

九十年代文化思潮新景觀

諷刺的是，進入90年代之後的中國文化界，「後現代主義」作為西方引進的思想和文藝潮流卻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熱門話題。不過，這是在一個學術界文化界受到「商品熱」強大衝擊，日益邊緣化和寂寞冷落的氛圍下的「熱門」，與當年「文化熱」時的「啟蒙」、「理性」話語一呼百應的氣氛，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遲來的「後現代主義」畢竟為當代中國文化界製造了某種新的景觀，儘管熱衷於此的學者們（以北京的一批中青年學者為主）實際上並不太在乎「後現代」的西方本文與語境^⑩。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後現代文化思潮」一方面認為「後現代」的離心、解構、「拼貼」(pastiche)和「先鋒派文藝」(主要指蘇童、余華等的「實驗小說」、新潮美術、實驗電影等「精英文化」)，將在文化錯位和無序的時代進一步「遠離權威意識形態」^⑪；在另一方面，又借助利奧塔對「現代性」神話和「啟蒙話語」的批判，將80年代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思

潮歸結為「拯救意識」和「啟蒙話語」，來重新界定80年代與90年代的區別^⑫。

與80年代相比，當代西方批評理論似乎在中國文化界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文化熱」遽然中斷後留下的理論空白。但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批判鋒芒，在中國卻受到了有意無意的淡化。這並不簡單地因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控制。實際上，官方的意識形態決策機構的立場相當紊亂和曖昧，並未像西方媒介所描述的在不斷地強化着意識形態控制。在另一方面，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大眾文化潮，西方批評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的抨擊，卻為中國文化界學術界提供了頗為得力的批判武器^⑬。應指出的是官方並未鼓勵這種對大眾文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式的批判：官方色彩較強的學者與刊物（如《文藝理論與批評》、《當代思潮》等），一直保持着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敵意和冷漠。批評理論與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在90年代的中國推動了一種新的傾向，這一傾向本身具有某種不確定、曖昧和歧義的特徵，帶有刻意經營的「後現代」色彩。在大眾文化（港台流行歌曲、MTV、西方影視、廣告、時裝和通俗文學等）日益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主導的情形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二元對立，逐漸成為理論話語的主要話題^⑭。

總之，自70年代末中國社會與文化逐漸進入全面的轉型期以來，文化思潮時有大起大落，為近代史上一個色彩紛呈的時代。西方的文化潮流，特別是批評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之間有着複雜而密切的聯繫，在馬

在大眾文化日益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主導的情形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二元對立，逐漸成為理論話語的主要話題。

克思主義、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問題上，尤其突出。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課題，也是很困難的課題。自己研究自己和以當代觀當代，真是談何容易。不過當前又是一個文化轉型的時代，是一個通過對他者、對差異的理解和對話，而重新認識和確定自我的時代。對話應是開放和未完成的。世紀交替之際，正為我們的對話在新的層次上的展開提供了契機。

註釋

① *Modern China*的專輯見拙文〈中國現代文學在西方的轉型〉，《二十一世紀》(93年19期)，註③；又見拙文〈理論與現實——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潮的嬗變〉，《今天》(1993年第2期)和張隆溪〈再論政治、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答劉康〉，《二十一世紀》(93年20期)(以下簡稱〈答劉康〉)。又見潘少梅：〈一種新的批評傾向〉，《讀書》(93年9期)。

②④⑤⑦ 〈答劉康〉，頁140；143；143；141。“Ghetto”的定義，可參見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條文。

③ 以在美國的中國學者而言，已有張隆溪論中西比較詩學、筆者與唐小兵編中國現代文學的論集，由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出版社出版。陳小眉、魯曉鵬、張英進、劉禾、呂彤鄰等的中國現代與古典文學論著，近期亦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分期出版。

⑥ 參見 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i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vol. I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p. 178–208.

⑧ 張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今天》(1992年第4期)，頁225。

⑨ 見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tra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366–75；又見拙文〈一種轉型期的文化理論——論巴赫金對話主義在當代文論中的命運〉，《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拙

著《對話的喧聲——巴赫金文化理論述評》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⑩ 西方後現代主義理論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是詹明信在1985年的北大講演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關於90年代以來的中國「後現代主義」，見 Wang Ning: “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 The Chinese Case and Its Different Versions”,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rch/June 1993), pp. 49–61。主要論著有王寧：〈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接受與變形：中國當代先鋒小說中的後現代性〉，均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1992年第1期)；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⑪ 陳曉明：〈文化拼貼的時代——對當代文化的一種讀解和批判〉，《文藝爭鳴》(1993年第5期)，頁5–12；以及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⑫ 張頤武：〈對「現代性」的追問——90年代的文學的一個趨向〉，《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頁74–80。

⑬ 張頤武：《在邊緣處追索——第三世界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陶東風：〈慾望與沉淪——當代大眾文化批判〉，《文藝爭鳴》(1993年第6期)，頁10–22。較「新潮」的批評家們，近來對賈平凹新著《廢都》的大眾文化「商品性」發起了猛烈攻擊。如《〈廢都〉滋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廢都〉廢誰》(學苑出版社，1993)等等。

⑭ 參見《二十一世紀》第17、19期上陳平原〈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和許紀霖〈精英文化的自我拯救〉等文。

劉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